

周志培 / 著 邵志洪 / 审

汉英对比与 翻译中的转换

C-E Contrastive Stud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科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基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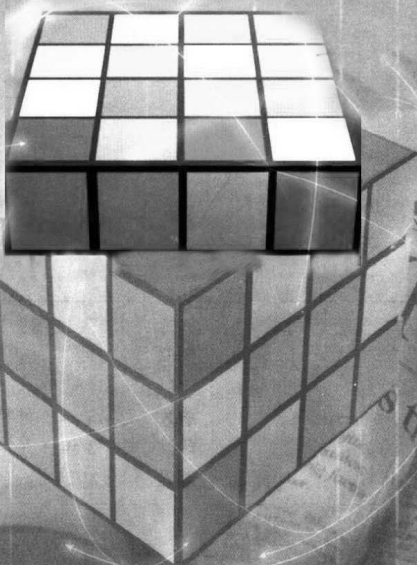
周志培 / 著 邵志洪 / 审

汉英对比与

翻译中的转换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在几十年英语教学经验和材料积累的基础上,以中外语言学家,特别是翻译理论家的理论作为指导写作而成的。它兼容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每一章都有恰到好处的理论分析和详实的例子。本书适合于英语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阅读,也可供大学中文教师、英语教师以及翻译工作者作参考,还可以用作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教材或参考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周志培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5628-1411-2

I. 汉... II. 周... III. 英语-翻译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417 号

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
教育基金资助项目

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 C-E Contrastive Stud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Translation

周志培 著
邵志洪 审

出版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1/32
社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印张	17.125
邮编	200237 电话(021)64250306	字数	628 千字
网址	www.hdlgpress.com.cn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
印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印数	1-3050 册

ISBN 7-5628-1411-2/H·327

定价:29.50 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前 言

哈德曼(Hartmann, 1980)指出,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某种语言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可以说语言现象的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括对这一现象的各种表现的比较分析。翻译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转换,涉及到两种语言在表达某一文本的同一个内容时的各种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有的是相似的,有的是有差别的。在翻译的双语转换过程中可以说时时处处都在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可以这样说,没有对比,就没有翻译。

一般说来,翻译中的语言对比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是对两种语言现时状态的静态比较。其目的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是指在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法中看出其差异所在;异中求同是找出相异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共同点,最终在这些相同和相异点中总结出翻译中双语转换的规律,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本书的目的是首先从理论上对汉、英语各层面的结构进行对比,然后运用大量的实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转换规律。在语言对比分析的过程中,参与学界对某些有争论的语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尝试作些既有深度也有广度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章是关于思维与语言关系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思维决定语言,有的学者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我们认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以思维为起始点的双向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人类在没有语言之前就有了思维,思维是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所以决定人类思维的首先是客观现实,不是语言。语言产生后,人类的思维开始由语言来承载,由语言来表达,思维模式由语言凝化。在由语言凝化了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语言可以推动新的思维模式的形成,这一新的思维模式又可由语言来凝化,这就是思维—语言—思维的发展过程。在原有循环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一轮的循环,如此往复循环,人类的思维与语言就会得到不断的发展。

第二章是关于汉、英语特点的讨论。认为“人治”与“法治”、“柔性”与“刚性”、“隐性”与“显性”等等只是表征现象,真正本质的差别是“意合”与“形合”,而造成这一本质差别的最起始因素是两种语言不同的语音和文字。

AcB23/05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关于哲学思想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就会有怎样的表达方式,是哲学思想决定或影响语言表达方式。我们认为,哲学思想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思维的成果。这一思维成果可以表现为理论思维的形式,而理论思维的形式必然要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以及由概念范畴构成的哲学命题表现出来,而概念范畴和哲学命题要用语言来承载。所以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代表者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与语言表达方式的关系就如同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一样。

第五章是关于汉语话题与主语的讨论。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话题(主题)—述题(评说)是语用概念,主语—谓语是语法概念。我们认为,根据汉语的特点,话题在汉语中既是语用概念,也是语法概念。这样的话题身兼两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话题主语。其理由是:汉语话题是原地基础生成的;而英语的话题不是原地基础生成的,而是为了语用的目的从别的位置上移动到话题位置上的。它是话题,但可以不是主语。汉语的话题原来就在那个位置上,所以它可以既是话题,又是主语。

第六章是关于连动式谓语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几个动词连在一起,中间无逗号,语气上无停顿为连动式谓语。而如果几个动词连在一起,中间有逗号,语气有停顿,有些动词甚至带有自身的修饰语,对这样的结构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是复合式谓语,有的称之为连贯复句。我们认为,根据汉语的特点,特别是从双语转换的视角上看,这是一种公因话题连动流水句。

第七章是关于汉语的几个特殊句式的讨论。如“把”字句的“把”究竟是什么词,始终是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是介词,有人认为是副词,有人认为是动词。我们认为“把”在这里是引导词,其功能是作话题标记。

第八章是关于动态与静态、动词优势与名词优势的讨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汉语是以动词为优势,英语以名词为优势;另一种观点认为,汉语以名词为优势,英语以动词为优势。这两种说法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不全面的一面。我们认为,这里要区分语法和使用频率两个概念。汉语语法以名词为重点,而使用频率上动词占优势;英语语法以动词为重点,使用频率上名词占优势。

第九章是关于被动和主动的讨论,特别是汉语被动句的形式

标志问题。在一些论述翻译的书中,汉语被动句的形式标志罗列了十几个,除了“被、让、叫、给”以外,还有“由、遭、受、挨、加以、得到、是……的、为……所”等。我们认为,这里混淆了形式标志与词汇手段的界线。实际上,可以作汉语被动句标志的只有“被”以及与其有部分相同功能的“给、叫、让”。

第十章是关于文化翻译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翻译不单是语言的转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的转换。换句话说,翻译是语言的翻译,也是文化的翻译。我们认为,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有两类:大文化(宏观文化)与小文化(微观文化)。大文化是文本的整体文化以及文本植根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小文化是蕴含在文本语言结构中的文化因素。文本的整体文化是不能翻译的。翻译是语言的转换,即文化载体的转换,而整体文化只能移植、传递,不能翻译。蕴含在语言结构各层面的文化因素,即小文化视情况可以转换翻译,也可以移植传递。所以我们说,翻译只能是语言的转换和部分小文化的转换,大文化是不能转换、不能翻译的。笼统地说“文化翻译”,至少是不全面的。

在参与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不是为了参与而参与,我们的着眼点还是翻译中的双语转换。为此,在每一章节我们配备了大量的汉英与英汉双向的译例。这些译例大多选自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体裁和少量的经典小说,大都是名作名译,具有代表性,可供读者学习和研究时参考。

本书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领导,特别是荣国斌教授的鼓励与鞭策。本书中部分论点和例句引自译界前辈和年青学者的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作者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教过许多课程,翻译课是后期的主要课程。本书内容大多是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中的积累。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欠妥及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指正。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邵志洪教授对本书的审阅以及宁灿林同志所给予的大量的具体帮助。

作者

2003年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1 现实、思维和语言	(1)
1.1.1 思维和思想	(1)
1.1.2 语言	(1)
1.1.3 现实、思维、语言三者的关系	(4)
1.2 思维与翻译	(22)
1.2.1 思维是人类的,语言是民族的	(22)
1.2.2 思维与翻译	(23)
1.2.3 翻译中的跨越式思维	(24)
1.2.4 语义支点与结构支点	(26)
1.3 语言对比中的共性研究和差异研究	(28)
第二章 意合与形合	(32)
2.1 概说	(32)
2.2 英语的形合手段	(34)
2.2.1 形态变化	(34)
2.2.2 形式词	(38)
2.3 英语的意合	(44)
2.3.1 成语、谚语、哲理性语言	(45)
2.3.2 以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意合成的句子	(45)
2.3.3 形式词简约后构成的意合句	(46)
2.4 汉语的形合手段	(46)
2.4.1 内部形态与缀合法	(46)
2.4.2 语音重叠	(49)
2.4.3 形式词	(50)
2.5 汉语的意合	(55)
2.6 汉英语语言组织样态对比	(58)
2.6.1 词层面样态对比	(59)
2.6.2 短语(词组)层面样态对比	(73)
2.6.3 简单句层面样态对比	(95)
2.6.4 复句层面样态对比	(102)
2.7 汉英语各层面基本结构对比小结	(119)
2.7.1 汉英语各层面基本结构样态	(119)
2.7.2 汉英语各层面基本结构样态各自的一致性	(122)
2.7.3 有无形态变化是汉英语差别之根本	(125)

2.8	不符逻辑与歧义	(126)
2.8.1	不符逻辑	(126)
2.8.2	歧义	(127)
2.9	开放、封闭、左扩展、右扩展和中扩展	(130)
第三章 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及意合规律		(136)
3.1	汉语的特点	(136)
3.1.1	语音方面	(136)
3.1.2	词汇方面	(137)
3.1.3	语法方面	(137)
3.1.4	文字方面	(138)
3.2	汉语的意合规律	(141)
3.2.1	逻辑律	(142)
3.2.2	心理上的重轻律	(148)
3.2.3	音韵律	(152)
3.2.4	排偶律	(164)
第四章 汉英语语言文化对比		(171)
4.1	文化、思维、哲学与语言	(171)
4.2	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法的对应与观照	(176)
4.2.1	“了悟”	(177)
4.2.2	“天人合一”	(182)
4.2.3	“一阴一阳谓之道”	(193)
第五章 话题(主题)与主语		(197)
5.1	主位与述位	(197)
5.2	英语的主位与述位	(204)
5.2.1	无需倒装的主位化	(207)
5.2.2	需要倒装的主位化	(209)
5.2.3	代词填空	(211)
5.2.4	虚主位	(211)
5.2.5	英语主述位小结	(217)
5.3	汉语的话题与评说	(218)
5.3.1	汉语主谓宾之争	(218)
5.3.2	主语突显与话题突显	(222)
5.3.3	语用上的话题——语法上的主语	(233)
5.4	话题与主语的翻译	(236)
5.4.1	主谓谓语中的大主语——话题主语的翻译	(236)

5.4.2	盒套式话题句的翻译	(243)
5.4.3	公因话题句的翻译	(245)
5.4.4	存现话题句的翻译	(257)
5.5	汉英语主语对比与翻译	(277)
5.5.1	英语的主语	(277)
5.5.2	汉语的主语	(278)
5.5.3	翻译中的主语问题	(283)
第六章 谓语对比与翻译		(294)
6.1	概说	(294)
6.2	谓语对比	(295)
6.2.1	英语谓语	(295)
6.2.2	汉语谓语	(296)
6.3	连动式在翻译中的双语转换	(298)
6.3.1	连动句与公因话题连动流水句	(299)
6.3.2	英语连动意义的表达法	(302)
6.3.3	汉语连动式的翻译	(305)
6.3.4	公因话题连动流水句的翻译	(309)
6.3.5	英语具有连动意义的句子的汉译	(318)
6.4	兼语式的翻译	(319)
6.4.1	英语兼语意义的表达方法	(320)
6.4.2	汉语的兼语式	(324)
6.4.3	汉英语兼语表达式的异同	(326)
6.4.4	汉语兼语句的英译	(327)
第七章 汉语的特定句式		(340)
7.1	“把”字句	(340)
7.1.1	“把”字句的特点和功能	(340)
7.1.2	“把”字句的类型	(343)
7.1.3	“把”字句的翻译	(346)
7.1.4	具有处置意义的英语句子可译成汉语“把”字句	(352)
7.2	动词复现句	(354)
7.2.1	动词复现句的特点和功能	(354)
7.2.2	动词复现句的翻译	(356)
7.3	“是”字句	(357)
7.3.1	“是”字句的特点与功能	(357)
7.3.2	“是”字判断句	(357)
7.3.3	“是”字存现句	(367)

- 7.3.4 “是”字强调句 (369)
- 7.3.5 特殊的“是”字句 (377)

第八章 动态与静态——动词优势与名词优势 (381)

- 8.1 概说 (381)
- 8.2 动词优势与名词重点 (381)
- 8.3 汉语:语法以名词为重点,使用频率动词占优势
英语:语法以动词为重点,使用频率名词占优势 (384)
- 8.4 动态与静态 (392)
- 8.4.1 动词——静态与动态 (392)
- 8.4.2 名词——静态与动态 (395)
- 8.4.3 形容词——静态与动态 (399)
- 8.4.4 副词——静态与动态 (400)
- 8.4.5 介词——静态与动态 (402)
- 8.5 翻译中动态与静态的转换 (405)
- 8.5.1 英译汉中的动静转换 (407)
- 8.5.2 汉译英中的动静转换 (418)

第九章 主动与被动 (427)

- 9.1 概说 (427)
- 9.2 英语被动意义的表达 (430)
- 9.2.1 英语结构被动句 (430)
- 9.2.2 英语意义被动句 (433)
- 9.3 汉语被动意义的表达 (434)
- 9.3.1 有形式标志的汉语被动句 (436)
- 9.3.2 用词汇手段表示被动意义 (438)
- 9.3.3 意义被动句 (441)
- 9.4 可以译成英语被动句的汉语句式 (441)
- 9.4.1 无主句 (442)
- 9.4.2 泛指人称句 (442)
- 9.4.3 话题评说句 (443)
- 9.4.4 “由”字句 (443)
- 9.4.5 “是……的”句与“……的是”句 (444)
- 9.4.6 “把”字句 (445)
- 9.5 汉英语被动意义表达方式的比较 (446)
- 9.5.1 汉英语结构被动句的差异 (446)
- 9.5.2 汉英语意义被动句的差异 (448)
- 9.6 被动意义相关句式在翻译中的转换 (449)

9.6.1 英译汉中的相互转换	(449)
9.6.2 汉译英中的相互转换	(455)
第十章 文化与翻译	(472)
10.1 概说	(472)
10.2 语言与文化	(477)
10.3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480)
10.4 宏观文化与微观文化——大文化与小文化	(481)
10.5 文化翻译与文化移植	(483)
10.6 移植传递——异化,翻译转换——归化(同化)	(487)
10.7 小文化——文本语言结构中的文化因素	(491)
10.7.1 文化词	(491)
10.7.2 文化含义词	(492)
10.8 文化因素的移植与转换	(498)
10.8.1 文化词的处理法	(498)
10.8.2 A类文化含义词的处理法	(499)
10.8.3 B类文化含义词的处理法	(500)
10.8.4 C类文化含义词的处理法	(502)
10.9 译例分析	(505)
10.9.1 汉译英译例分析	(505)
10.9.2 省略处理法	(524)
10.9.3 英译汉译例分析	(524)
参考文献	(530)

最近,由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阅读了一些新近出版的有关汉英(英汉)对比及翻译的书籍和文章,得益匪浅,但是也有几个问题,由于说法不一,引起了我的思考。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诚然,在语言比较与语言对比研究中,除了作表层结构的对比以外,更重要的要作语义—结构的对比,而语义—结构对比就一定要深入到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中去。最近的这些著作与文章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汉英语的对比中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使汉英语的对比研究提高了一个层次。但有些提法还值得深入研究。

1.1 现实、思维和语言

1.1.1 思维和思想

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思想?这两个概念在辞典中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解释。但就哲学逻辑和语言学来说,思维是人脑认识客观现实的一种活动,思维过程是一个由概念到判断、由判断到推理的过程。即首先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概念,然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最后运用判断进行推理。到此人的思维经历了第一轮循环,但并没有终结,接着是新一轮的循环,即在第一轮概念判断推理中形成的概念的基础上再进行判断推理又形成一个新概念,如此循环往复,校正与深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此往复深入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过程中,每一次形成的概念、判断和推理都是思维的成果。这些成果就是思想。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的形态,其作用相当于语言中的词语和句子。

1.1.2 语言

思维和思想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要用语言文字才能表现出来。于是自古以来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语言是什么?人类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是怎样的?是思维决定语言还

是语言决定思维？或者是语言和思维是一个整体的两面？语言、思维和客观现实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辨析，在人类思想的早期，在东方和西方都有哲人思索研究过，并发表过不同的见解。

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乎与中国的庄子同时对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探索。

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摹写，是思想的图像。人头脑中的思想状况，被人用声音表达出来，这就是语言（褚孝泉 1991）。而人类能不能通过这样一种语言来获得一个或者说表述一个对客观现实的科学认识，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在语言内部，是无法找到保证其传递的信息的科学性的途径的。而亚里士多德不这样悲观，他认为语言在词这个层面上不存在真伪的问题，也就是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在句子这个层面上，即当词构成句子时才可能发生真伪的问题（褚孝泉 1991）。比如孤立的词“书”、“狮子”、“苏格拉底”，我们无法说它们是真是伪。而只有到了句子里，“这是一头狮子”，“苏格拉底在跑”，“书在桌子上”等，我们才能判断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亚里士多德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区分为符号所指概念和符号的具体指称物两个层面，实际上区分了词的“所指”和“能指”。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里，将语言区分为“所指”与“能指”是其基本出发点，尽管他还没有使用后来索绪尔提出的这两个术语。

庄子说：“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庄子·知北游》）这句话中庄子也提到“名”和“实”这两个语言层面。同一个“名”可以指称几个不同的“实”，同一个“实”可以由几个“名”来指代。“名”与“实”和“能指”与“所指”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与反面那样的共存关系。而庄子的“名”与“实”的关系是“主”与“宾”的关系，“实”就是主，“名”就是宾，互相独立又不平等。那么在庄子的理论里语言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语言是图像，正如他在《庄子·秋水》里说的：

“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故异，此势之有也。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物之粗者，是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東西，是通过感官可以感知的，因此是可以用语来表达的，是事物的低级形态；物之精者是感官不能把握的东西，所以用语言不能表达，只能通过思想去掌握、

理解,是高级形态;物之不期精粗者是最高级的形态,对这一层次的理解掌握,便是对“道”的掌握了(在这里,他把言语和意义分开,这与他的“名”与“实”是一脉相承的)。这三种形态在人脑中的映象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物之粗者可用语言描绘,而语言描绘出来的是一种图像,不是一种符号;物之精者是从语言描绘出来的图像中领悟到的某种精妙的意义,也就是庄子所说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至于说到“道”,既超越了语言,又超越了意义,无法局限在变通的图像中,难以表达,而它却又无所不在。比如说,我们看到旭日东升,物之粗就是视觉器官可看到的东:曙光,红太阳,云彩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染上各种色彩,或者旭日从大海上升起,海面随着太阳升起而抹上颜色,由墨绿而浅绿,而浅蓝,而闪闪发光。这些都可用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一幅图像。物之精,就是人们在看到这个旭日东升的壮观的场面时领悟出来的种种微妙的意味和情感,如千变万化,朝气蓬勃,气势恢宏等,这些微妙的意味和情感也可从别人语言描述的图像中领悟到。这种所谓的物之精者是不能用语言直接表达的,而只能通过程序设计来体味其中的“意”。将语言看作是反映世界事物的图像,这不仅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观点,先秦时代的大多数哲学家也是这种看法。比如与庄子哲学观点不同的墨子也是这样看待语言的。他说,“举,拟实也;言,出举也。”又说,“言之者,诸口之能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墨经·说上》)“拟实”,“若画虎”,就是图像。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了语言是符号的理论萌芽。正如上面已提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分析是建立在将语言划分为能指、所指这样两个层面上的。西方哲学家继承这一思想,将语言中的单位,比如说一个词,剖析为二,分为形和义两个部分,即能指和所指,赋予词语以符号的地位。对能指进一步分析,就可分析出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一系列语法范畴。这样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的理论在西方沿用了两千多年,并由此建立起了一部形义两分、以形为传统的传统语法。在这个传统语法中,不是将语言研究建立在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内部,把语言中的单位当作都是自足的单位来研究。这一传统后继得力,经过两千多年的总结和分析,对语言内部结构和“形”的分析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形成了西方语法学和语言学的强大传统。

中国传统的语言观非常不同。正如上面已提到的以庄子为代表的哲人认为语言是外部客观现实的图像,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也就是说把语言放在人的思维、意识和世界

这样一个大的整体关系中来探究,而对语言内部的结构、形和义等问题是忽略的。因此从庄子开始的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有对语言作语法结构分析的必要和可能。除了为读懂古籍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音韵学、训诂学以外,就没有一本完整的语法书籍。一直到了20世纪初才有马建忠写成的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由于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马建忠只能从西方语法中去汲取营养,模仿西方语法。他将拉丁语以形态为主的模式往汉语上套,寻找相应的结构分析方法。后来又有了黎锦熙按英语语法模式完成的《新编国语文法》。从他们开始汉语语法研究已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期间虽也有过多次大争论,并有许多改进和完善,但总还是有许多问题得不到完美的解决。人们开始意识到,恐怕汉语的研究要抛开原来的框框,另起炉灶,走自己的路。于是才有一批年青的学者出来呼吁,要创立自己的汉语语法框架。他们不仅呼吁,而且在这方面已做出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1.1.3 现实、思维、语言三者的关系

在我们的一些汉英(英汉)对比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到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因此导致了或影响了汉语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好像是思维方式决定了(导致了、影响了)语言结构。也有人说语言决定(影响了)思维。那么语言和思维(思想)究竟是什么关系?语言、思维与客观现实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一番的。这也正是自古以来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关注的问题。

前文已提到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摹写,是思想的图像。人头脑中的思想状况,被人用声音表达出来,这就是语言。

庄子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道不可言,言而非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明的是另一个观点,那就是语言有其极限,不能完全表达思想。

语言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即语言是否能确切可靠地反映或表达客观现实的问题,也是自古以来思想家所特别关注的。

在古希腊时代,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兴起了一个诡辩论派。人们注意到语言的影响力,认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打动人的感情,影响人的思想,让人们来接受和支持你的观点。至于所用语言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则不重要。只要达到目的,用什么语言、手段都可以在所不惜。所以,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

里士多德,当时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保证语言表达客观现实的可靠性。柏拉图注意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注意到如何保证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一致性。他认为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名称的认识,第二阶段是对这个事物的定义的认识,第三阶段是对这个事物的表现的认识,第四阶段是对这个事物的科学认识,第五阶段是对这个事物的自身的认识。他认为,前三个阶段完全可能由于与这个事物自身不一致而形成错误的认识。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在语言内部,是无法找到保证其传递信息的科学性的途径的(褚孝泉 1991)。

亚里士多德将语言符号的意义区分为符号所指的概念和符号的具体指称物两个方面,而且词的所指概念与其具体的指称对象可以是不同的。但他认为如果将语言分成词与句两个层次,那么在词的这个层次上反映的客观现实是真实的,而到了句子层面就可能有真伪问题。为了鉴别句子陈述的是否是真理,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这个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的体系被称为三段论。这一逻辑学说至今仍有其价值,是一个有力的思想工具,一般的逻辑学中都要介绍这个三段论。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语言表达的是否是真正的客观现实也表示怀疑。庄子在《庄子》一书中,这种质疑就随处可见,最后竟发展到了“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程度。而孔子的著名论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是为中国人所熟知。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会发生背离,语言为什么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又可能使人类误解世界;既可作交流思想的有效工具,又可作欺骗误导的得力手段。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的哲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对语言、思维和现实的思考开阔了视野,找到了更多的新角度,发现了更多的新关系。西方不再停留在古希腊哲人们对语言有时会反映谬误的担忧上,而是突破如何保证语言表达真理的课题。中国也不再停留在以庄子为代表的语言难以表达客观现实的终极真理的这一命题。摆脱了这些旧的视角和课题,中西方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和探索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早在1620年弗兰西斯·培根就在他的《新工具》中说,“人们以为他们的理性支配词语;其实,同样真实的是词语反作用于理解。”(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这说明了在几个世纪以前人们思考的已不只是语言如何表达思想和现实的问题,而是已经想到了语言又如何反作用于思想了。

自 19 世纪到 20 世纪,语言、思维与现实的的关系的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有了许多成果和各种见解。这些见解简单说来不外乎两种:一是认为语言决定或影响思维,二是思维决定或影响语言。语言决定或影响思维的理论认为语言反映的不是客观的现实世界,而是由说各种语言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切分过的客观现实世界。

除了这两种两端的理论,还有两种我们概括为双向“反作用”的观点。一种是从语言决定论中派生出来的,认为首先语言决定(影响)思维,然后思维再能动地反作用于语言,即语言—思维—语言;第二种是从思维决定(影响)论中派生出来的,认为首先思维决定语言,然后语言再能动地反作用于思维,即思维—语言—思维。

A. 语言决定思维的理论

首先来看一下语言决定论的洪堡特及其学派。

洪堡特(W. Humboldt, 1767~1835)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文中说道,“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转引自伍铁平 1986)后来这一学派发展为两支,都被称为新洪堡特主义。一支是以欧洲的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Leo Weisgerber)为代表,人们一般称他们为语言决定论者(linguistic determinism)。魏斯格贝尔认为在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隔着一层“中间世界”,这就是语言。语言不同,世界图像也不同。他认为研究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每个语言的世界观。”他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星座的例子。他说,“小熊星座、大熊星座、天蝎星座等星座的名称完全是人为的,而并非客观存在的反映。因为实际上这些星座的星星彼此之间相距几百到几千光年,各有不同的运行轨道,相互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并不组成任何星座,只是人类从地球上空看天空,它们仿佛很接近,人们才将它们归入相应的星座,人为地赋予各种名称。如果从另一星座看这些星星,情景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就不会有这些星座及其名称了。”同样,人们把有些草叫做“野草”,实际上,现实世界中并没有这种分类。如果按植物分类说,那些被叫做“野草”的并不是同一科属的,人们之所以称其为“野草”,完全是从是否对庄稼有害这个角度来切分的。这一学派的另一位语言学家瓦尔特布尔格(W. Von Wartburg)在其《语言学的问题和方法论》中说得更直接,“我们说掌握语言,但是,实际上是人被语言所掌握。”

另一支新洪堡特学派就是美国的萨丕尔(E. Sapir)和他的学生沃尔夫(B. L. Whorf)。萨丕尔在他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